

中央音乐学院院史

(一九五〇—一九九〇)



中央音乐学院院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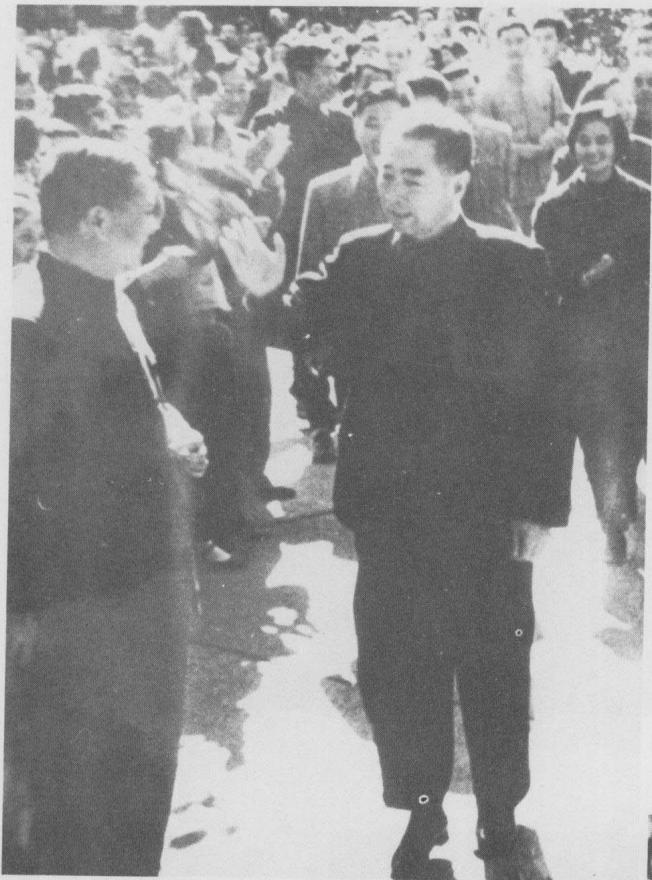
(附中央音乐学院大事记 1949 年 8 月至 1989 年 4 月)



1963年12月30日我院师生在中南海为中央领导同志演出，
演出后毛主席与学院师生亲切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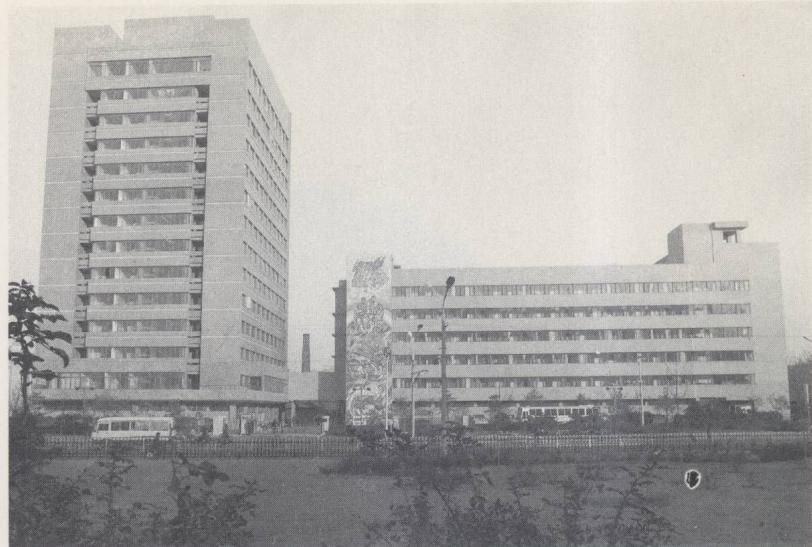
1963年12月30日我院师生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同志演出。演
出后，刘少奇同志与学院师生亲切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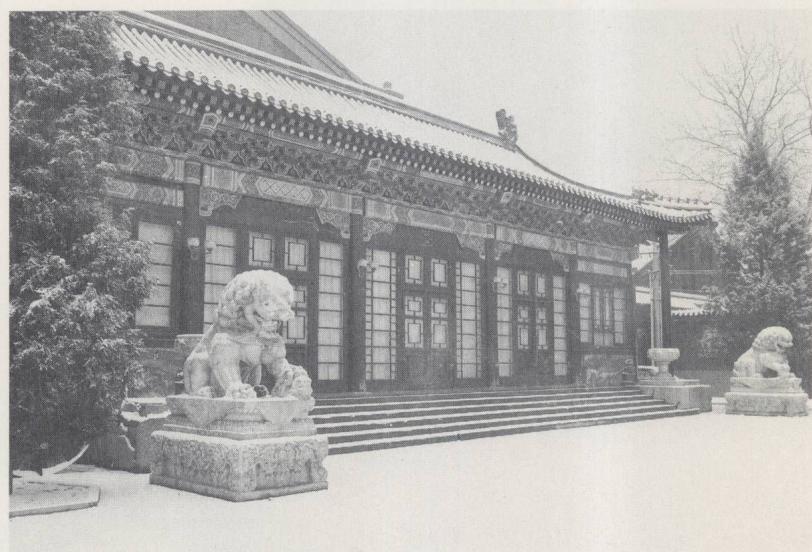
1963年3月7日周
恩来总理来我院视察



1960年邓小平同志、贺
龙同志和我院红领巾乐
队合影



1986年落成的新校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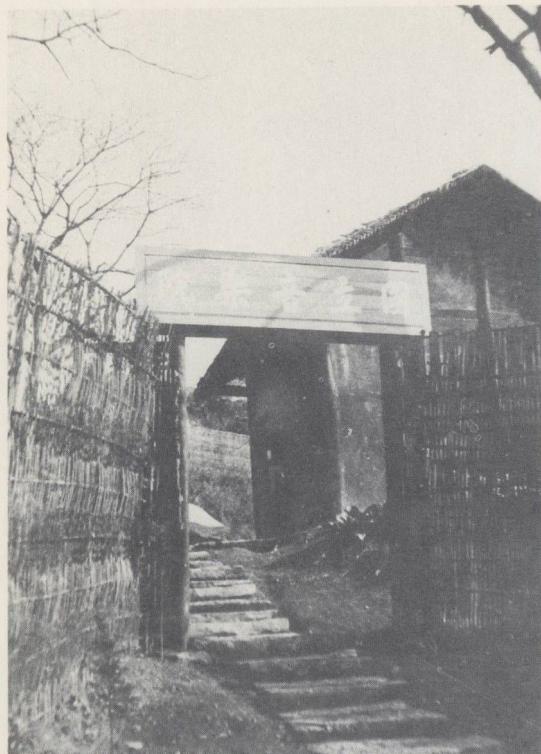


校园雪景

(大礼堂前门，建于196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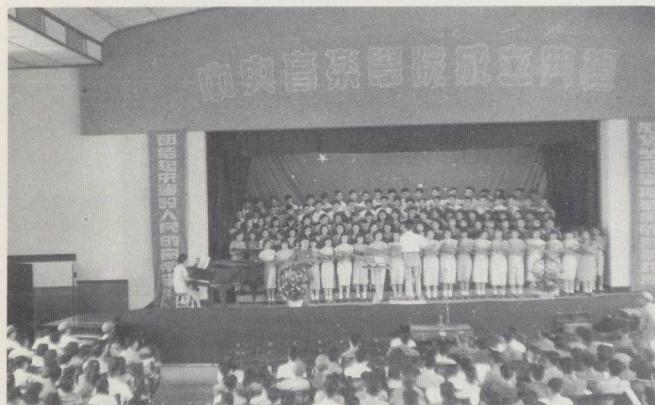
1986年落成的演奏厅



1940年重庆市青木
关国立音乐院校门



建院初期在天津我
院学生参加义务劳动



1950年6月17日我院在
天津隆重举行建院开学
典礼



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马思聪



1950年建院初期学院领导人之一吕骥同志



1989年9月第二任院长
赵沨陪文化部领导参观
学院



第三任院长吴祖强在
1989年元旦团拜会上



第四任院长于润洋1988
年在我院首届教代会上
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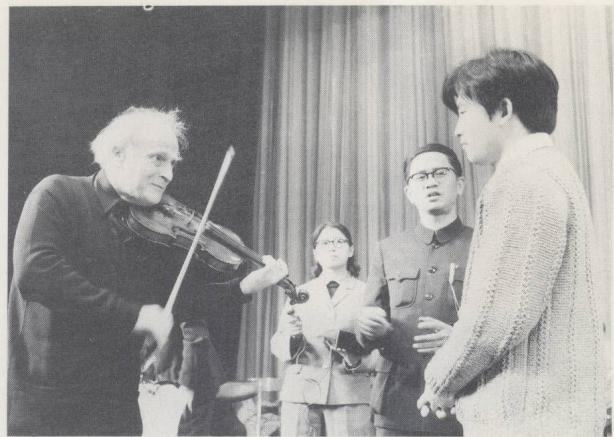
右上：我院名誉教授耶胡迪·梅纽因在示范教学（198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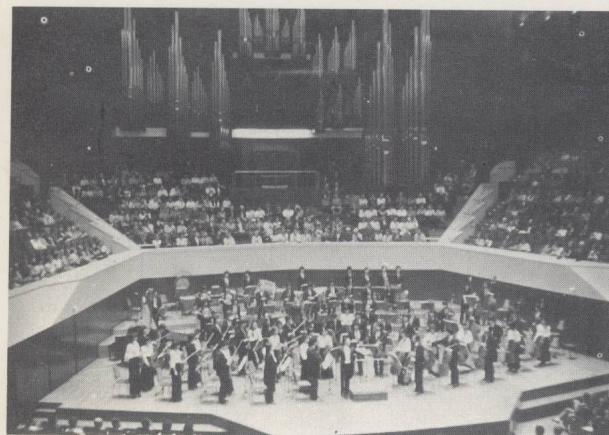
左上：1957年赵沨副院长欢迎苏联专家古诺夫

右中：1984年我院歌剧系学生梁宁、迪里拜尔在芬兰国际声乐比赛中分获第一、第二名，在表彰大会上和指导教师沈湘教授等合影

左下：1989年全国优秀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获得者林耀基教授在上课

右下：1983年5月作曲系学生谭盾创作的第一弦乐四重奏《风雅颂》在国际作曲比赛中获二等奖





右上：中央音乐学院民乐团在1989年
第二届中国艺术节演出

左上：1983年声乐系毕业生演出歌剧
《绣花女》

右下：教师学术研究部分成果展示

左中：1989年我院合唱团在演出

左下：1987年中国青年交响乐团在莱
比锡演出

前　　言

今年是中央音乐学院建院四十周年。正值学院进入“不惑之年”之际出版这部院史，应该说是格外有意义的。小至一个人，大至一个国家、民族，总是要从对自身历史的回顾中去认识自己，反思自己，并从这里获得继续前进的精神力量，一所学院当然也是如此。

中央音乐学院从四十年前由来自五湖四海的一班人马艰苦创业直到今天，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昔日一所规模不大的学院雏型，如今在整体结构上已经形成从附小、附中、专科、本科直到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多层次的完整体制；在专业设置上发展为从创作、理论到表演的一套完整的多学科体系。由于在业务上所达到的水平和成就，中央音乐学院已经成为一所在国内国际都具有很高声望的音乐学府。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央音乐学院的历史从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反映和标志了建国四十年来我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成长和发展。

回顾学院四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我作为一个从学生时代便生活在这里的亲身经历者，真是感触良深。四十年间，我们的学院经历了一个多么曲折的发展路程，其间，有成功也有挫折，有聚集也有离析，有大踏步的前进也有令人困惑的徘徊，然而学院毕竟不断地成长着，壮大着，进入了她不愧为“不惑之年”的成熟时期。四十年来学院在风雨和动荡中愈加茁壮的成长和发展，显示了她具有一种强大的内在生命力。这种内在生命力的源泉，在我看来正是学院的这支勤奋队伍所具有的那种对祖国音乐教育事业的进取和献身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我们的学院就不会有今天。这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东西。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的学院正面临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相信，将学院推向更加辉煌的未来的，仍应该是这种精神！我想，也许这就是我们应该从这部院史中所获得的启示和精神力量。

于　润　洋

目 录

前 言

中央音乐学院院史	(1)
第一章 建院始末	(2)
第一节 沿革	(2)
一 青木关国立音乐院		
二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		
三 东北鲁艺文艺学院音乐系		
华北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		
四 中华音乐院		
五 北平燕京大学音乐系		
第二节 筹建	(6)
第二章 初建阶段(1950.6—1958)	(13)
第一节 概述	(13)
第二节 建院初期(1950.6—1952.9)	(14)
第三节 走向正规化	(18)
一 组织建设		
二 以教学为主，全面学习苏联		
三 学习和研究民族民间音乐		
四 艺术实践		
五 文化交流		
六 结语		
第四节 马思聪与吕骥	(29)
一 马思聪		
二 吕骥		
第三章 中兴与曲折(1958—1976)	(35)
第一节 概述	(35)
第二节 分院、迁院与再次分院	(37)

第三节 建立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教育体系	(38)
第四节 稳定教学秩序，大力开展教材建设	(41)
一 教学秩序的恢复	
二 教材建设	
第五节 师资队伍建设	(47)
第六节 创作与演出	(48)
第七节 赵 涊	(50)
第八节 文革时期	(52)
第四章 “改革、开放”时期中的中央音乐学院(1976. 10—1989. 4)	(55)
第一节 概 述	(55)
第二节 “拨乱反正”，重建正常的教学秩序	(56)
一 甄别、平反工作	
二 招生盛况	
三 整顿教学工作	
四 又一次分院	
第三节 学院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	(59)
一 干部队伍的建设	
二 领导体制的改革	
——试行院长负责制	
三 教学管理体制的改革	
——推行“学年学分制”	
四 由半封闭教育走向全面开放教育	
第四节 教学兼容并蓄，学派纷呈	(65)
一 办学思想的新发展	
二 继续抓紧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水平向新的高度发展	
三 大力推进新的教学秩序	
四 对外文化交流	
第五节 科研、创作、表演、实践	(74)
第六节 教辅、基建和后勤工作	(84)
第七节 吴祖强与于润洋	(88)
一 吴祖强	
二 于润洋	
中央音乐学院大事记(1949. 8—1989. 4)	(94)
附 表	
一 中央音乐学院历届党政主要负责人名单	(158)
二 中央音乐学院主要教师、科研人员名单	(160)

三	中央音乐学院历届毕业生、在校生统计表.....	(169)
四	中央音乐学院专业设置演变情况表.....	(171)
五	中央音乐学院历年正式出版的学术论著统计表.....	(173)
六	中央音乐学院参加全国音乐作品评奖名单.....	(177)
七	中央音乐学院参加国内音乐比赛获奖名单.....	(179)
八	中央音乐学院参加国际音乐比赛获奖者名单.....	(184)

中央音乐学院院史

中国高等音乐教育事业发轫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最早萌生的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如：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上海专科师范音乐科、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平艺术专门学校设置的音乐科等，开始了现代音乐教学，之后在上海于1927年肖友梅首创国立音乐院（后改名“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等一批音乐院校及师范院校音乐系科的建立，则揭开了中国历史上专业音乐教育史新的一页。而后经几代人之辛勤耕耘，历数十载世间之沧桑，俟至五十年代初，中央音乐学院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她与各兄弟音乐院校一起为我国音乐事业贡献出不少出类拔萃的人才，使中国音乐得以逐渐步入国际乐坛，足以证明我国培养专门音乐人才的音乐院校的教学质量已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是应引以自豪的。

坐落在北京内城西南角原清朝醇王府（光绪生地）旧址的中央音乐学院，而今已然是飞檐碧瓦的古建筑群与高耸云天的现代建筑群交相辉映，中西乐声不绝于耳，织就成一个绚丽的音乐世界，这里就是中国的最高音乐学府，她直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亦为全国几十所艺术院校中唯一的一所全国重点院校。

发展至今，中央音乐学院业已有四十年的历史了。认真总结中央音乐学院四十年来在专业音乐教育上的得失成败，给予从事音乐教育事业的教职员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以资现在与未来办学之借鉴。

第一章 建院始末

中央音乐学院的历史并非从零开始，应该说是产生于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各具特色的几所高等音乐院、校、系的联合和继续。她们是南京国立音乐院、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燕京大学音乐系，以及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音乐系、华北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香港、上海中华音乐院等。其主体为国立音乐院。本章将分述上述各院、校、系的成立、建制、教学、人员、办学经验、何时迁津以及各自特色等，以及学院的筹建情况。

第一节 沿革

一、青木关和南京的国立音乐院

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的许多音乐家（诸如上海国立音专的师生，北平等地区的音乐家）云集大后方之重庆和西南诸省，从事教育、宣传、办刊物、演出等活动。1938年底在重庆成立一群众团体“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贺绿汀^①、赵沨、刘雪庵、唐学咏等人任理事。同时教育部也成立“教师服务团”，收容来自沦陷区的教师。另外，凡来重庆的各地音乐家，均在重庆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进行登记。在此基础上，于1940年初教育部开始筹建“国立音乐院”，除教育部官员外，参加筹建的主要负责人为胡彦久^②、应尚能^③，尚有王宗虞^④等人协理筹建工作。

国立音乐院于1940年9月在重庆青木关正式成立。是时，重庆小龙虾的“音乐教导员训练班”全体人员亦均转入该院。为和原上海国立音乐院相区别，习惯上称青木关国立音乐院。该院首任院长为谢寿康，然其时为驻比利时公使，故从未到校视事，而由教育部次长顾毓琇代理院务。1941年秋，杨仲子出任第二任院长，翌年，杨仲子调任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院长一职由当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⑤兼任该院院长。1943年起由吴伯超接任院长，直至南京解放。应尚能、李抱忱、陈田鹤等先后出任教务主任。

青木关国立音乐院为学制五年的专科学校，并附设实验管弦乐团（由金律声、张洪岛^⑥分别任正、副团长）。本科分国乐、理论作曲、声乐、键盘乐器、管弦乐器五组。1941年春并曾开办音乐教育讲习班，于同年9月1日结业。1945年增设十年制幼年班。1942年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其中教师多半是原上海国立音专师生）结束，教育部将其接管后成立国立音乐院分院，翌年迁重庆松林岗，由戴粹伦出任分院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暑假，国立音乐院本科迁南京，幼年班迁江苏常州。

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有理论作曲、外国音乐史、音乐欣赏、合唱、国乐概论、视唱练耳、乐

学、钢琴、小提琴、大提琴、风琴、指挥、长笛、小号、声乐、琵琶、二胡、筝、艺术概论、国文、英文、德文、体育、历史、军训、救护学、韵律活动等课程，并拥有一支较强的教师队伍，其中包括一些外籍教师，如作曲家江定仙、陈田鹤、刘雪庵、刘烈武、张文纲、邱望湘、林声翕，音乐理论家缪天瑞、张洪岛、杨荫浏⑦，钢琴家易开基⑧、丁善德、洪士铿⑨、李昌荪、范继森，声乐家应尚能、胡然、黄友葵、蔡绍序、张权、魏启贤、翟立中、茅爱立，小提琴家戴粹伦、陈洪、章彦⑩、王人艺、盛雪，二胡演奏家储师竹⑪、陈振铎、刘北茂⑫，琵琶演奏家曹安和，筝演奏家曹正，大提琴家黄源澧⑬、马思琚，长笛演奏家韩中杰，指挥家吴伯超，铜管乐演奏家夏之秋⑭，以及外籍教师弗兰克尔（德籍作曲家）、余夫佐夫（俄籍大提琴家）、拉扎罗夫（俄籍钢琴家）、苏石林（俄籍声乐家）、阿德勒（德籍小提琴家）、卡丽瓦夫人（比利时籍钢琴家）、葛棣华女士（比利时籍钢琴家）等。

国立音乐院对艺术实践方面也极为重视，经常举办音乐会，为师生提供演出机会。1940年9月刚刚建院，即举行国立音乐院附设实验管弦乐团首次公开演出，其后重要的演出活动有与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队、国立音专同学会联合在重庆举办纪念黄自的音乐会（1941年5月）；黄友葵与胡然在重庆联合举行独唱音乐会（1942年夏）、江定仙作品音乐会（1944年）；学生举办的“民歌演唱会”（1945年）等。为庆祝旧政协签订“双十协定”，由学生自治会组织学生在青木关民教馆举办“新春音乐会”，演出自编节目及星海的《新年大合唱》等（1946年春）；国立音乐院师生参加重庆文化界举行的纪念冼星海音乐会（1946年1月），演出了《黄河大合唱》等作品；幼年班同学参加上海第一届儿童音乐比赛，囊括管弦乐比赛全部获奖名次（1949年4月）；幼年班乐队担任三野文工团演出的《淮海战役组歌》的伴奏任务（1949年5月）等。

在开展学术研究方面，学生热情很高，于1945至1946年相继成立了“山歌社”、“中国音乐社”、“黄钟社”等社团。其中的山歌社是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颇为重要的音乐学生社团之一。他们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下，提出“以集体学习方式来搜集及整理民间音乐，介绍西洋进步音乐（包括技术及批评的理论），普及音乐教育，提高音乐水准，以达到建立民族音乐为目的”的宗旨。曾出刊《山歌》（《西南日报》副刊）、《山歌通讯》，出版了《中国民歌选》（线谱，钢琴伴奏）、《五声音阶及其和声》等。

自1940至1949年，国立音乐院在校就读的本科生共五百四十九人（包括少数借读生和选修生），幼年班百余人，加上音乐教员讲习班等，总数约在七百人左右。国立音乐院作为当时的一所规模最齐全的正规音乐专门学校，她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

1948年底，当解放军逼近南京时，在院教职员及同学们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组成了“应变会”，开展护校斗争，迎接解放。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南京军管会派军代表接管学校，中共国立音乐院党支部在整党后正式公开活动，六名党员为黄祥鹏、李佺民、吴祖强、罗兰如、夏清华、桑叶舟；代理院长为宋广祥。同年10月奉中央人民政府命并入中央音乐学院，由于天津院址还待修建，决定先按期招生、上课，于1950年4月15日，国立音乐院教职员九十六人，并携带原该院的全部动产抵津。

吴伯超 音乐教育家、指挥家吴伯超出生于1903年，江苏武进县（今常州）雪堰桥镇人。